多维赋能博物馆在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中的作用

◎ 崔逸雯

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保管者”，更是文化的“活化者”与“传播者”。作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博物馆主要发挥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有助于守护文明根脉、赓续文化基因。

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国在国际社会提升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博物馆肩负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启迪公众智慧的重要使命，需要积极创新以突破传统功能边界，向大众展现更具生命力的文物形态，并构建开放共享文化传播体系助力历史文化充分传播。本文围绕博物馆核心功能与作用展开分析，并着重探讨如何更充分、系统地发挥博物馆在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中的多维作用。

博物馆：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基石与枢纽

物质载体守护者。在收藏方面，博物馆要以“系统性”为目标，制定科学严谨的藏品收纳标准，包括历史代表性、艺术独特性、科技标志性等，系统收藏有特色且具有研究价值的藏品。要构建资源储备库，为后续有条理地收纳打下基础。在保护方面，博物馆可依托专业化技术体系实现多层次、立体化保护，如通过环境监测设备实时调控温湿度、光照、空气质量等指标，避免文物在不良环境中发生物理化学反应，尤其对于更“脆弱”的文物，需运用无菌封装、惰性气体存储等方法实施进一步保护；组建修复师团队修复遭到破坏的文物，尽可能确保其原真性，达到延续历史风貌的作用。

知识体系构建者。博物馆要围绕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学术研究，深度解析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应以馆藏实物为研究对象，充分参考相关文献档案与考古成果，并依托历史考证、工艺分析、材质检测等手段对文物制作技术、使用场景、社会功能进行还原。在此基础上，开展类型学比较与谱系梳理，深入阐释文物背后反映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组织形态、审美观念变迁等，构建起物证与历史脉络的因果关联，并据此延伸和转化研究成果，基于新的阐释诉求开启新的研究。

文化价值传播者。博物馆可通过陈列展览方式让公众接触和观摩藏品。在此过程中，博物馆不只是单一陈列，还要做好知识传达工作，在陈列展览前基于研究成果展开主题凝练、内容分层、形式设计等。其中，主题凝练旨在为陈列展览提供方向，如围绕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选择展览内容；内容分层强调进一步规划，包括文物组合、辅助展品安排、图文系统设计等，旨在形成证据链，使公众更有逻辑地欣赏和观摩文物的叙事逻辑；形式设计则着重陈列展览效果，通过空间重塑、流线规划、灯光音效设计、互动装置引入等手段，营造沉浸式认知环境。

集体记忆塑造者。博物馆凭借真实性与直观性，可让公众深入感知历史记忆，成为公众系统接触和了解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加之博物馆按照历史时序进行梳理和安排，能更清晰地呈现地域文明发展脉络，让公众将历史记忆与社会生活图景相对接，增强文化传播实效性。在身份认同塑造中，博物馆可通过阐释地方文化独特性与国家文明连续性，帮助公众宏观梳理历史轨迹、微观了解地域发展，深化“我是谁”身份认知，进而建立基于文化根脉的身份自信。

现实挑战：传承弘扬历史文化面临发展瓶颈

资源保障不到位。截至2022年底，我国备案博物馆达6565家，其中90%以上为非营利性机构，但财政拨款仅覆盖其运营成本的30%–50%。博物馆运行和发展需要资源保障，资源不到位时会制约历史文化传承和弘扬。资金投入不足与不稳定是重要表现，会造成馆舍基础维护、相关设备更新换代等受到阻碍。专业人才不到位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博物馆运行需要多种专业人才的支持，会造成博物馆收藏保护、研究阐释、展示传播等效能被削弱。数据显示，全国文博系统18万名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仅5万余人，平均每家博物馆专职修复师不足10人。

“文物活化”不足。一是部分藏品“深锁库房”。大量珍贵文物长期处于“沉睡”状态，仅用于学术研究或内部保存，如博物馆库藏文物展出比例普遍偏低，大量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藏品从未与公众见面。与博物馆藏品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但这些成果往往停留在专业领域，未能有效转化为面向公众的、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阐释内容。二是展览形式相对固化，故事性、互动性、沉浸感有待提升，“让文物说话、让历史鲜活”做得不够。传统展览模式仍占主导，这造成信息传递单向、静态，为了引发观众共鸣，虽然也会采用一些互动手段，可存在单一或流于形式等问题，缺乏深度参与和探索性；很多文物常被作为孤立物件展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社会关系、制作工艺、使用场景、情感价值等未被充分挖掘和生动呈现，使得观众难以深入感知和理解。三是文创产品同质化、浅层化，未能深度挖掘文化IP价值，产业链整合能力弱。文创产品集中于常见品类，并且设计元素雷同，难以呈现背后的文化内涵、精神价值、美学特征等，同时存在对核心文化IP缺失系统性、长线开发问题，难以打造强大品牌效应，使其市场竞争力被削弱。

社会参与不足。公众常被定位为“受教育者”而非“文化共建者”，参与渠道象征性大于实质性。博物馆想要传承弘扬历史文化，不只是做好收藏和展示工作，还要积极与社会大众建立联系，并引导他们参与到相关工作中。可实际情况中，社会大众仍旧扮演“参观者”角色，鲜有参与博物馆事务的机会和渠道。志愿服务是重要渠道之一，但是志愿服务内容较为单一和浅层；与学校、企业等合作也是重要渠道，可目前来看，合作过程仍旧是“各自为政”，优势共享协同合作体系尚未形成。

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作用的路径探索

强化顶层设计与资源保障。在政策法规层面，国家应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与博物馆管理的专项法律体系，明确博物馆在历史文化传承中的法定职责与权益边界，为藏品征集、文物调拨、跨界合作提供法律依据；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将博物馆建设纳入国家及地方文化发展战略，并设立阶段性目标与评估机制，确保发展方向与社会需求同步。在资源保障方面，应建立分级财政保障机制，为博物馆运营提供多渠道资金来源。其中，专项拨款作为基础保障，需建立文化基金、设计专项金融项目、打造社会捐赠和赞助体系，切实支撑博物馆多元业务顺利开展。人才队伍供应也是重中之重。为向博物馆持续输送优秀人才，应健全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如在高等教育机构优化文博专业课程设置，将文物科技保护、展览策划等实践技能培养作为重点；完善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制度，提供人员研修、国际交流等机会，实现专业素养的有效提升。

深化学术支撑与价值转化。应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功能，通过深层次阐释历史文化，为其传承与弘扬贡献力量。在研究方向上，紧密联动宏观脉络与微观实证，如在宏观脉络梳理上将文物群历史演变谱系作为重点，深层揭示文明发展规律性特征，而微观实证则需进一步对接单体文物、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依托有价值个案探索某种文化的宏观遵循与特色价值。在研究方法上，应积极引入新技术推进革新，如引入无损检测技术解析文物材质构成与老化机理、引入数字化建模技术复原残缺文物原貌、引入数据库用于类型学统计与时空分布研究等，进而获得更精确、更具验证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获得研究成果后，还需通过价值转化发挥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效能，如博物馆应组建专项团队深度参与研究过程，将学术发现与展览叙事、教育传播等融合，同时与教育部门、出版机构等建立合作，确保学术研究成果以更多形式准确传播。

创新形式与精准服务。博物馆作为公共场所，需积极创新陈列展览、教育传播形式，并提供精准服务，以帮助公众高质量理解历史文化。在陈列展览内容设计上，可采用主题式、问题式叙事替代编年体陈列，如设置“文明对话”“技术变革”等主题，引导公众深度思考；形式表达上可积极运用新型技术进行呈现，如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复原历史场景、依托交互装置模拟文物制作流程等，让参观者可沉浸式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亲身体验制作流程。在服务方面，可围绕教育服务规划“分众化”体系。例如，针对学龄前儿童开展感官探索活动，使其在触摸仿制品、角色扮演中建立历史初印象；针对中小学生设计探究式课程，结合文物组织手工实践、史料分析等跨学科学习；针对成年观众提供专题讲座、文化沙龙等深度内容，满足其知识更新需求；针对老年群体及特殊人群优化无障碍设施，定制慢节奏导览服务。

深化社会参与与公众互动。博物馆作为公众共建共享的文化枢纽，应积极拓展社会与公众参与渠道，进而发挥凝聚社会共识作用，构建历史文化传承共同体。在个人参与层面，可建立志愿者常态化招募与培训机制，明确讲解辅助、教育活动协作等岗位职责，发挥公众的知识传播协同作用；开放藏品征集工作建议平台，鼓励公众提供文物线索，增强馆藏的社会关联性；设置展览策划意见征询环节，广泛吸纳公众对主题选择与展示形式的建议。在机构参与层面，博物馆可与学校联合开发校本课程，将自身资源转化为教学素材；与社区文化中心联合举办流动展览，使历史文化服务深入基层。此外，还应建设互动平台，有效提升参与度。例如，设立“文物认养”公益项目，引导公众直接参与文物保护；组织观众参与文物修复观摩、考古模拟体验等实践活动，深化对文化遗产的理解；搭建线上讨论社区，鼓励观众分享观展心得、研究发现等，形成知识共享新生态。

促进文旅融合与创意衍生。博物馆还要将“跨界融合”作为重要策略，深入激活文化资源，为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提供有力支持。在文旅融合中，应将开发文旅产品作为重点，如开设主题旅游线路，将博物馆参观与历史街区、考古遗址等关联整合，形成文化体验集群；策划特色研学项目，结合地方历史脉络开设实地考察、非遗手作等深度体验课程；打造博物馆夜间开放品牌，通过灯光演艺、文化市集等延伸服务范围，丰富旅游消费场景。同时，博物馆可与文化创意企业合作，共建文物IP授权规范，支持企业开发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功能的文创产品，促进收益反哺文物保护；联合设计机构提取文物元素，应用于城市公共艺术、数字媒体作品设计，拓展文化符号传播载体；举办文化创意赛事，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主题创作，推动优质作品产业化。此外，在创意开发中，应重视数字业态创新，开拓增量空间。例如，开发文物主题沉浸式体验馆，运用全息投影、体感交互等技术重现历史时空；制作文物题材纪录片、动画短片，通过流媒体平台扩大传播；探索数字藏品发行，以区块链技术确权文创资产，培育新型文化消费模式。为了确保文旅融合与创意衍生项目切实提升博物馆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效能，应建立评价机制，旨在衡量相关项目对地方经济发展、文化品牌建设等的贡献程度，进而为博物馆进行项目调整提供依据，确保历史文化价值得到更大规模传播与可持续转化。

结语 >>>>>>>>>>>>>>>>>>>>>>>>

博物馆应以“历史的百科全书”与“文化的会客厅”为使命，在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夯实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协同多方合力，通过强化顶层保障夯实发展根基、依托深度研究活化历史叙事、创新传播形式拓宽辐射半径、深化公众参与构建文化共同体、推动文旅融合激发内生动力等途径，使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枢纽，进而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支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活力，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让海洋文化成为“大思政课”的精神动能

◎ 邱荟汀

海洋文化，扎根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血脉基因，必兴于新时代“向海图强”的伟大进程。海洋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领域，海洋文化则是中华民族经略海洋的精神根脉与智慧结晶，海洋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育人价值元素，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将海洋文化融入“大思政课”建设，不仅契合高校为党和国家育新人、兴文化的使命要求，而且为新时代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努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价值引领。

海洋文化融入“大思政课”的理论体系

海洋文化的物质形态和精神特质统一于人类海洋实践的历史进程。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既承载着海纳百川、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等精神特质，又包含了船载器具、港口遗址、贸易遗存等物质载体，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维度支撑，不仅为“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素材与价值图谱，还延展了其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将海洋文化融入“大思政课”建设，能够在激活海洋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场域体验、遗产保护、考古实证、生态实践、科创赋能等环节，持续挖掘海洋文化的育人功效。

海洋文化的认识深化和实践路径统一于铸魂育人的辩证过程。海洋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蓝色基因，其特定的叙事逻辑和话语形式为“大思政课”提供了丰富的内涵滋养。将海洋文化融入“大思政课”建设，能够立足海洋强国战略，结合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以讲清海洋历史、讲透海权法理、讲活蓝色故事的话语形式，走深海洋研学、走实海洋保护、走活海洋传承的实践方式，向海同行、向海而聚、向海图强。

海洋文化的价值内化与行为外显统一于育人实践的双向转化。海洋文化是联结中华民族历史与未来的文化，不仅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优秀基因，还在当下展现出了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将海洋文化融入“大思政课”建设，能够使宏阔的海洋历史叙事转化为可触、可悟、可践、可传的教育元素，充分发挥其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力量之源，构筑学生家国海疆的情感纽带、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新时代海洋强国有我的挺膺担当，并逐渐成为持久性、自觉性、稳定性的行为范式与文化品格。

海洋文化融入“大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为“大思政课”筑牢文化根基，注入自信动能。海洋文化的深厚底蕴最终都要以教育为载体落地生根。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绵延不绝的文化脉络中，海洋文化始终是重要组成部分。从先民造船技艺的智慧结晶到郑和七下西洋的开放胸襟，从妈祖文化中的人文关怀到近代海防战争中的民族气节，海洋文化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生动且有说服力的当代“教科书”。海洋文化融入“大思政课”建设，能够以具象化的历史场景、精神符号展现完整的文化根系，如学生在触摸古代舟船遗物时感知先民的探索勇气，在聆听渔民号子时体会劳动人民的坚韧，在了解“海纳百川”的处世哲学时理解文化包容的深层价值，不仅让“大思政课”更具历史纵深感，更能激发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信，为思政教育提供持久的文化自信底气。

为“大思政课”涵育时代精神，注入创新动能。海洋精神是海洋文化“活的灵魂”，它不仅蕴含在民族精神之中，更是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高度联结，新时代“大思政课”的核心使命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在现有的思政课基础上进行守正创新。海洋文化所凝结的精神谱系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精神，呼应着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时代召唤；“四海一家”的“和合”精神，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层追求；刚毅无畏的冒险精神，诠释着深化改革、攻坚克难的奋斗底色；勇立潮头的开拓探索精神，彰显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要义；崇敬海洋的人海和谐精神，回应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命题。将海洋文化与时代需求精准对接并融入“大思政课”建设，既守住了“铸魂育人”的根本，又通过对其精神内涵的时代性解读注入了创新动能。

为“大思政课”强化主权认知，注入战略动能。“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战略为海洋文化发展提供了根本方向，为“大思政课”在社会大课堂中注入大局思维、大局意识。海洋文化融入“大思政课”建设需要以“讲政治”为导向将育人需求转化为刚性战略指引。从南沙岛礁建设中“吹沙填海”的技术突破、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划定，到“蛟龙号”深潜、“雪龙号”科考，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到维护海洋安全的自觉，海洋文化中蕴含的主权观念、海防意识、海洋权益认知、海洋安全践行，是解读国家战略的关键密码。“大思政课”的政治性内核不仅在于对意识形态的引领，更在于对国家顶层设计战略的清晰阐释，借助海洋文化注入的战略动能，能够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海洋战略相联结，成为强化国家主权认知、培育战略思维的“助推器”。

为“大思政课”拓宽国际视野，注入共生动能。海洋是联通世界的纽带，海洋文化具有天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与“大思政课”所要彰显的“大视野”高度契合。海洋文化为“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跨越国界的对话平台，不再是单一民族与海洋互动的历史记忆，而是被纳入全球海洋治理的话语体系，成为诠释“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无论是文明互鉴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还是全球治理中的“共建共商共享”，都是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培育“天下一家”的胸怀。新时代，潮平两岸阔，这种以海洋文化为桥的国际视野教育，让“大思政课”的精神动能延伸至全球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

海洋文化融入“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守好阵地“主位”。课程是思政教育的主阵地，思政课是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课堂”。海洋文化融入“大思政课”建设要铸牢“主位”意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紧扣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立足现有教育资源基础，构建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闭环。在此基础上，需主动抢占“海洋叙事”话语权，推动话语体系创新，让海洋文化成为阐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扩音器”。

讲好蓝色故事“海味”。自信是文化传播的前提，讲好海洋故事需彰显文化特色和底色。要聚焦海洋文化中最具感染力的元素，通过具象化的“海味”细节，如渔船、渔歌、港口等，保持故事的原生态质感，同时要提炼海洋文化中的精神内核，并与新时代价值追求相呼应，使学生在聆听中体悟海洋文化的魅力，从“知其然”的文化认知，到“信其道”的情感认同，逐渐升华为文化自信的行为自觉。

巧用海洋场域“古味”。海洋场域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活化石”，巧用其“古味”才能从抽象感知走向具象认知，让历史现场成为沉浸式教育的课堂。要系统梳理我国现存的海洋文化遗产，将其中具有场域属性的遗产通过保护性开发转化为“大思政课”的实践教育基地，让其成为与学生对话的“历史老师”，引导学生从实物遗存中读懂海洋文化的历史根脉，进而投身海洋文化保护行动，树立正确的海洋观念。

强化数智赋能“新味”。教育数字化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更是推动海洋文化纵深融入“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引擎。在智媒体语境下，需构建以海洋文化为核心的多元叙事生态，遵循“数据+现实”的双线标准，激活教育学理性和体验愉悦性的双向互动。同时，要扩大数字化优质海洋文化内容供给，创新数字海洋文化的多样表达形式，并渗透式融入思政教材与教学体系，使“大思政课”在数智赋能中更具时代张力。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